

荀子势论爬梳

强中华

(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, 四川南充, 637009)

摘要:荀子所谓势即权力、地位。荀子认为只有得势, 君子的政治理想才能有效付诸实践, 造福于民。势固然重要, 然君子求势必以其道, 宁不得势而不可失道, 更不可趋炎附势。得势之人君, 必须以道处势, 否则民心不服, 势则必去。荀子还主张势不可齐, 势位、财富的等级看似不公, 实则至公。荀子论势比法家片面强调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势, 而蔑视仁义道德深刻得多。

关键词:荀子; 势; 道

中图分类号: B222.6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2-3104(2009)05-0739-04

法家人物对势的看法已经广为学界深入研究, 而荀子势论仍未引起足够关注^{①[1](8-9)}, 有鉴于此, 本文拟对此进行考察。《荀子》^[2]一书中, “势”字共八十四见, 含义有三: 第一, 权力, 地位; 第二, 情形, 情况; 第三, 必然趋势。后两种意义属于寻常用语。因此, 荀子的“势”, 就是指权力、地位。其势论, 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。

一、求势的必要性

在荀子看来, 地位和权力对于君子来说非常重要, 只有拥有地位和权力, 才能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, 造福于生民。

荀子认为, 人天生具有趋恶的潜质, 如果“君子非得势以临之”^{[2](144)}以礼法, 常人则懵懵懂懂, 智慧不启, 德行不进。“今圣王没, 天下乱, 奸言起, 君子无势以临之, 无刑以禁之, 故辨说也。”^{[2](904)}君子不得势, 正言就得不到有效宣传, 邪说也不会受到禁止。《性恶》有云: “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, 以为偏险而不正, 悖乱而不治, 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, 明礼义以化之, 起法正以治之, 重刑罚以禁之, 使天下皆出于治, 合于善也。是圣王之治, 而礼义之化也。今尝试去君上之势, 无礼义之化, 去法正之治, 无刑罚之禁, 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。若是, 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, 众者暴寡而哗之, 天下之悖乱而相亡, 不待顷矣。”^{[2](947)}可见, 立君上之势的目的在于有效实施各种治国方略, 使社会归于大治。如果“明君临之以

势”, 则可“道之以道, 申之以命, 章之以论, 禁之以刑”^{[2](904)}, 即以道德之威感化民众^②, 以正道引导民众, 以命令促成民众, 以道理说服民众, 以刑法禁止邪行。

在荀子看来, 舜、禹“是圣人之得势者”, 既得势, 则可“一天下, 财万物, 长养人民, 兼利天下”^{[2](212)}, 以致“通达之属, 莫不从服, 六说者立息, 十二子者迁化”^{[2](212)}。周公, “武王崩, 成王幼, 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, 恶天下之倍周也。履天子之籍, 听天下之断, 偃然如固有之, 而天下不称贪焉。杀管叔, 虚殷国, 而天下不称戾焉。兼制天下, 立七十一国, 姬姓独居五十三人, 而天下不称偏焉。教诲开导成王, 使谕于道, 而能揜迹于文、武。周公归周, 反籍于成王, 而天下不辍事周; 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。”^{[2](260)}所谓“履天子之籍”, 即居天子之位, 显然亦为得势。周公既得势, 则可便利行使国家权力, 诛灭叛臣管叔, 剿灭商纣余孽, 分封诸侯, 巩固天下。仲尼、子弓品德高尚、才智开通, 然而他们不得势, 故功业不如舜、禹、周公卓著。《成相》有云: “水至平, 端不倾, 心术如此象圣人。而有势, 直而用拙必参天。”^{[2](985)}也就是说, 圣人心术平正如水, 若能得势, 严于律己, 宽于待人, 功业必与天齐。可见, 势非常重要, 既如此, 求势就必然具有合理性。

二、势与道的关系

在荀子看来, “夫薄愿厚, 恶愿美, 狭愿广, 贫愿

收稿日期: 2009-03-24

作者简介: 强中华(1978-), 男, 四川南江人,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, 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2007级博士研究生, 主要研究方向: 先秦诸子。

富,贱愿贵,苟无之中者,必求于外。故富而不愿财,贵而不愿势,苟有之中者,必不及于外。”^{[2](943)}追求势位乃人类的普遍天性。既然如此,是否可以顺从天性,不论手段,追逐权势?否!荀子认为,势固然重要,但求势必以其道,处势必以其道。

秦昭王曾问荀子:“儒无益于人之国?”荀子回答道:“儒者法先王,隆礼义,谨乎臣子,而致贵其上者也。人主用之,则势在本朝而宜;不用,则退编百姓而恚,必为顺下矣。虽穷困冻馁,必不以邪道为贪。无置锥之地,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。呜呼而莫之能应,然而通乎财万物、养百姓之经纪。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,在人下则社稷之臣,国君之宝也。虽隐于穷阎漏屋,人莫不贵之,道诚存也。”^{[2](266)}可见,对于儒者来说,首先不在于是否得势,而在于是否身正德高,明于治道。若身正德高,明于治道,得势则可为王公之才;若不得势,德才依旧,绝“不谄贵者之权势”^{[2](913)},即不趋炎附势。在荀子看来,道德高尚、心态平和,比权势及权势带来的享受重要得多。“心平愉,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,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,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,粗布之衣、粗絁之履而可以养体,屋室芦庾、蓐藁蓐尚机筵而可以养形。故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,无势列之位而可以养名。”^{[2](926)}荀子绝对鄙视“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”^{[2](222)},在他看来,求仕者理应为“厚敦者也,合群者也,乐富贵者也,乐分施者也,远罪过者也,务事理者也,羞独富者也。”^{[2](222)}意思是说,仕者必须首先德行高尚、亲和民众、乐得其富^⑤、谦虚谨慎、羞于独富、乐善好施、远离罪过、善于办事。得势而富贵,必须“富贵而体恭”,“富贵而体恭,杀势也”^{[2](75)},“灭权势之威,故形体恭谨”^{⑥[2](79)},也就是说,身处高位而不趾高气扬,而是谦虚谨慎。

渴望美名亦为人的普遍心理,然而对于美名,“不可以势重胁也”^{[2](284)},即不可凭借权势造成对别人的威压而获取名声。君子应该“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,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”^{[2](284)},这样“则贵名起如日月,天下应之如雷霆”^{[2](284)}。

在荀子看来,荣耀有“势荣”、“义荣”之别,耻辱有“势辱”、“义辱”之分。“志意修,德行厚,知虑明,是荣之由中出者也,夫是之谓义荣。爵列尊,贡禄厚,形势^⑦胜,上为天子诸侯,下为卿相士大夫,是荣之从外至者也,夫是之谓势荣。流淫汙慢,犯分乱理,骄暴贪利,是辱之由中出者也,夫是之谓义辱。詈侮摔搏,捶笞箠脚,斩断枯磔,藉靡舌^⑧,是辱之由外至者也,夫是之谓势辱。”^{[2](741)}君子的荣耀源于高尚的道德、明达的智慧即“义荣”,而不是在于显赫

的权势即“势荣”。君子的耻辱源于德行不修即“义辱”,而不在于受到刑法的侮辱即“势辱”。“君子可以有势辱,而不可以有义辱;小人可以有势荣,而不可以有义荣。有势辱无害为尧,有势荣无害为桀。义荣、势荣,唯君子然后兼有之;义辱、势辱,唯小人然后兼有之。”^{[2](741)}可见,德行、智慧总是优于权势、地位。

威信亦非来自权势。“礼乐则不修,分义则不明,举错则不时,爱利则不形;然而其禁暴也察,其诛不服也审,其刑罚重而信,其诛杀猛而必,黜然而雷击之,如墙厌之。”^{[2](646)}此为“暴察之威”。“暴察之威”乃是依靠严刑峻罚、残杀诛灭而树立起来的淫威。在淫威逼迫之下,“百姓劫则致畏,羸则敖上,执拘则最,得间则散,敌中则夺。非劫之以形势,非振之以诛杀,则无以有其下。”^{[2](646)}所谓“劫之以形势”,就是以权力、势位威胁百姓,这种威信绝不可取。真正的威信在于“道德之威”。所谓“道德之威”乃“礼乐则修,分义则明,举错则时,爱利则形。如是,百姓贵之如帝,高之如天,亲之如父母,畏之如神明。故赏不用而民劝,罚不用而威行”^{[2](646)}。可见,真正的威信与权势无关,而来自高尚的德行、得体的政治措施。

势在一定条件下可下发生变化,处势不以其道,则势一去不复返。“国者,天下之制利用也;人主者,天下之利势也。得道以持之,则大安也,大荣也,积美之源也。不得道以持之,则大危也,大累也,有之不如无之。及其綦也,索为匹夫不可得也,齐湣、宋献是也。故人主,天下之利势也,然而不能自安也,安之者必将道也。”^{[2](472)}身为人君,是天下之“利势”,然不以正道处之,则“利势”终去而“索为匹夫不可得”。桀、纣乃“圣王之子也,有天下之后也,势籍^⑨之所在也,天下之宗室也”^{[2](706)},桀、纣乃世袭人君,权势可谓显赫,“然而不材不中,内则百姓疾之,外则诸侯叛之,近者境内不一,遥者诸侯不听,令不行于境内,甚者诸侯侵削之,攻伐之。”^{[2](706)}桀、纣“积其凶,全其恶,而天下去之”^{[2](706)},势则不保。而汤、武,“修其道,行其义,兴天下之同利,除天下之同害,而天下归之”^{[2](706)},势则不求而民与之。

作为人君,怎样才算处势以道?“挈国以呼礼义,而无害之,行一不义、杀一无罪而得天下,仁者不为也。拯然扶持心国,且若是其固也。所与为之者之人,则举义士也;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,则举义法也;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,则举义志也。如是,则下仰上以义矣,是綦定也。綦定而国定,国定而天下定。”^{[2](472)}可见,以道处势,就是以仁爱之心为基础,以道义为原则,任天下贤士,用天下良法,引领群臣树立远大志向。若如此,则上行而下效,民

必归义，国定而天下安。

处势以道，势虽小而可大之。“取天下者，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，道足以一人而已矣。彼其人苟一，则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适它？故百里之地，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，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，循其旧法，择其善者而明用之，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。贤士一焉，能士官焉，好利之人服焉，三者具而天下尽，无有是其外矣。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势矣。致忠信，著仁义，足以竭人矣。两者合而天下取，诸侯后同者先危。”^{[2](495)}百里地，于势可谓小，然处之以道，重用贤能，损益法度，按章办事，则天下归心。文王据百里地而一天下，桀纣“厚于有天下之势而不得以匹夫老”^{[2](241)}。可见，“善用之，则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；不善用之，则楚六千里而为仇人役。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，是其所以危也。”^{[2](241)}

用兵不可驱民以势。“秦人，其生民也狭陋，其使民也酷烈，劫之以势，隐之以阨，忸之以庆赏，鲷之以刑罚，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，非斗无由也。”^{[2](607)}所谓“劫之以势”，即“以威势胁迫之使出战”^⑦。此种强迫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富国强兵，但不如以礼义教化“齐民”、“凝民”效果明显。所谓“齐民”、“凝民”，就是通过礼义教化，统一民心、凝聚民众、激发民志。这样的民众必然精诚团结、共御外敌、无往而不胜。“兵大齐则制天下，小齐则治邻敌”^{[2](608)}。齐桓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、吴阖闾、越勾践，可谓“和齐之兵”，然而未有本统。所谓“未有本统”，即虽用礼义教化，却不能持之以恒，故为“小齐”，小齐之兵，“可以霸而不可以王”。汤、武之兵，礼义教化以一贯之，是为“大齐”，“大齐”则王天下。可见，“劫之以势”乃权宜之计，不若礼义教化深谋远虑。

荀子分析了礼义教化优先于赏庆、刑罚、势诈^⑧^{[2](617)}等权宜之计的原因。“凡人之动也，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。赏庆、刑罚、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，致人之死。”^{[2](637)}也就是说，以赏庆、刑罚、势诈治兵，军队则以趋利避害为行动的唯一原则，这样的军队决不会为了赏赐，心甘情愿为国效命。强敌临境，“使之持危城则必畔，遇敌处战则必北，劳苦烦辱则必北，霍焉离耳，下反制其上。”^{[2](637)}秦国的军队属于功利之兵，秦国的用兵之道乃“以力兼人”、“佣徒鬻卖之道”。所谓“以力兼人”，即“非贵我名声也，非美我德行也，彼畏我威，劫我势。”^{[2](638)}统治者以淫威恐吓民众，驱而使战。迫于淫威，“故民虽有离心，不敢有畔虑。若是，则戎甲俞众，奉养必费，是故得地而权弥轻，兼人而兵俞弱”^{[2](638)}。所谓“佣徒鬻卖

之道”，即君与民遵循市场交易原则，民为利而战，君为战而赏。显然，“以力兼人”及“佣徒鬻卖之道”均“不足以合大众，美国家”^{[2](637)}。成功的用兵之道，必须“厚德音以先之，明礼义以道之，致忠信以爱之，尚贤使能以次之，爵服庆赏以申之，时其事、轻其任以调齐之，长养之，如保赤子。政令以定，风俗以一，有离俗不顺其上，则百姓莫不敦恶，莫不毒孽，若祓不祥。然后刑于是起矣。”^{[2](637)}可见，荀子的用兵之道绝非单纯的计策谋略，而是以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的正确治国方略。

“处胜人之势”，“行胜人之道”，任用贤才最为关键。“聪明君子者，善服人者也。人服而势从之，人不服而势去之，故王者已于服人矣。”^{[2](500)}所谓“善服人”即成功管理人才，成功管理人才的首要措施是“急得其人”。所谓“急得其人”就是迫不及待发现贤才、真心实意重用贤才。在荀子看来，“明主急得其人”，暗主却“急得其势”。暗主处处显示自己的威风，事事亲自操办，故“身劳而国乱，功废而名辱，社稷必危”^{[2](510)}。汤、武、桀、纣“处胜人之势”一也，汤、武“行胜人之道”，而桀、纣“善为人所恶”，故“天下偶然举去桀、纣而奔汤、武，反然举恶桀、纣而贵汤、武。”^{[2](655)}古往今来，急得“胜人之道”者寡，而急得“胜人之势”者多，故荀子叹息道：“上壅蔽，失辅势，任用谗夫不能制。郭公长父之难，厉王流于彘”^{[2](995)}，“忠臣蔽塞主势移”^{[2](976)}。

臣相权势显赫，亦为“胜人以势”。处“胜人以势”，必须懂得“胜人之道”。何谓“胜人之道”？“是为是，非为非，能为能，不能为不能，併己之私欲，必以道夫公道通义之可以相兼容者，是胜人之道也。”^{[2](655)}可见，“胜人之道”即抛却私欲、秉持公心、明辨是非、重用贤能、贬黜庸才。一国之相，“上则得专主，下则得专国”，据此“胜人以势”，理应“驱此胜人之势赴胜人之道，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，与之参国政，正是非”^{[2](655)}。若如此，“则国孰敢不为义矣？君臣上下，贵贱长少，至于庶人，莫不为义，则天下孰不欲合义矣？贤士愿相国之朝，能士愿相国之官，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，是一天下也。”^{[2](655)}

综上所述，求势以道、处势以道，为人则君子，为国则可长保。相反，不以其道，则小人，则势去，则国亡。

三、势之不齐的客观性

在荀子看来，“皇天隆物，以示下民，或厚或薄，

常^①不齐均。”^{[2](1012)}万物“不齐”乃不可改变之事实。同样,势亦不可齐同。理由如下:“分均则不偏^②,势齐则不一,众齐则不使。有天地,而上下有差;明王始立,而处国有制。夫两贵之不能相事,两贱之不能相使,是天数也。势位齐而欲恶同,物不能澹则必争,争则必乱,乱则穷矣。先王恶其乱也,故制礼义以分之,使有贫富贵贱之等,足以相兼临者,是养天下之本也。”^{[2](346)}也就是说,如果人们的地位齐同,分配收入一致,则期望得到的报酬也大致相同,然而有限的社会财富不可能满足每个人的要求,因此,势位必须有等差。荀子势位有等的看法似乎与平等思想格格不入,其实不然。荀子所谓的等差决不是因世卿世禄制度造成的先天差异,相反,“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,不能属于礼义,则归之庶人。虽庶人之子孙也,积文学,正身行,能属于礼义,则归之卿相士大夫。”^{[2](338)}人生而平等,资质相似,条件相同,但后天砥砺德行、学习知识的努力程度各异,故德有高低、智有高下、能有大小。势位作为一种报酬,理应与德行、智能、贡献相对应,这才是真正的公平^③。只有实行等差分配,德行较高、贡献较大的人才能享有较多的权利。说到底,势位的高下实际上既是一种功赏相类的回报^④,又是一种刺激人们积极向上的激励机制。作为回报,势位不齐正是社会公平的体现。作为激励机制,只有保证德行较高、贡献较大的人享有较高的势位,才可能催生出进一步砥砺品德、多作贡献的动力。而那些德行不高、贡献较小的人为了争取更高势位、享有更多权利,必然自发学习先进,提高自身才德,争取为社会多作贡献。这样,推动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就自然而然产生。荀子引用《尚书》“维齐非齐”的话深化自己的学说,所谓“维齐”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、公正,而“非齐”则指势位的实际差别,“非齐”看似不公,其实蕴含着付出与收获成正比这一至公。显然,荀子“维齐非齐”的思想比不分条件,一味追求平均主义深刻得多。

荀子还认为,在公平竞争的原则下,势位和财富形成等差后,须保持相对稳定。那些“志不免乎奸心,行不免乎奸道”,妄图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势位的“不肖”之人,遭到荀子的强烈反对。“少事长,贱事贵,不肖事贤,是天下之通义也。有人也,势不在人上,而羞为人下,是奸人之心也。”对于“不肖”之人,明君应“临之以势,道之以道,申之以命,章之以论,禁之以刑。”^{[2](904)}只有保持势位相对稳定,才能促进社会的平稳、持续发展。相反,如果人们交相争势,势位更替如走马灯,社会必然困顿不前。

势位的等差还表现在社会分工方面。社会分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,每个人都应明确自己的职责。“掩地表亩,刺中殖谷,多粪肥田,是农夫众庶之事也。守时力民,进事长功,和齐百姓,使人不偷,是将率之事也。高者不旱,下者不水,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,是天之事也。若夫兼而覆之,兼而爱之,兼而制之,岁虽凶败水旱,使百姓无冻馁之患,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。”^{[2](436)}对于君主来说,善于“材人”是其职责。君主若能合理安排“官人使吏之材”、“士大夫官师之材”、“卿相辅佐之材”,则“身佚而国治,功大而名美,上可以王,下可以霸”。相反,“人主不能论此三材者,不知道此道,安值将卑势出劳,并耳目之乐,而亲自贯日而治详,一日而曲辨之,虑与臣下争小察而褊偏能,自古及今,未有如此而不乱者也。”^{[2](561)}所谓“卑势出劳”,即卑其势位而竭其劳力,事无巨细,亲自操办。这样的君主,即使成天劳作,也只能使天下大乱。

综上所述,荀子非常重视势位,在他看来,君子得势则可实现伟大的政治理想,造福于民。君子求势必以其道,宁不得势而不可失道,更不可趋炎附势。得势之人君,必须处势以道,否则民心不服,势则必去。荀子还认为势位的等级是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。显然,荀子对势的看法比法家片面强调至高无上的权力,而蔑视仁义道德深刻得多。

注释:

- ① 涂光社先生《因动乘势》一书专论中国古代之势,但论荀子之势极其简略。
- ② “明君临之以势”,既是明君,则不以权势威胁人。《荀子·强国》论“威”有三:有道德之威,有暴察之威,有狂妄之威。笔者认为,此处之势,应理解为道德之威。
- ③ “乐得其富”,杨倞注云:“乐其道也。”杨倞注文完全抛开富贵不谈,其义不完整。笔者认为,荀子之意,即《修身》所云:“富贵而体恭”,与孔子所谓“富而好礼”义同。
- ④ 杨倞注。
- ⑤ 杨倞注:“形势,谓势位也。”
- ⑥ 王先谦曰:“势籍,犹势位。”
- ⑦ 杨倞注。
- ⑧ “势诈”,杨倞注云:“谓以威势变诈为尚。”“威势”属于本文所谓势的范畴。
- ⑨ “常”原作“帝”,王念孙认为应为“常”。
- ⑩ 王念孙认为“偏”读为“徧”,言分既均,则所求于民者亦均,则物不足以给之,故不徧也。下文曰:“势位齐而欲恶同,物不能澹”,正所谓不徧也。

(下转 800 页)